

---

#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才的影响

易永卿

**【摘要】**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所创立的理学思想成为湖湘学派的指导思想，并对后世湖湘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时，对湖南人才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湖南先后出现了南宋时期、明后期和清中期三个人才小波峰，并出现了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体。

**【关键词】**周敦颐；理学；湖湘文化；湖南人才群体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原名惇实，字茂叔，出身于北宋时期湖南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堡（今道县久佳乡楼田村）一个书香之家。他是湖南产生的第一个本土大思想家，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思想与实践对以后湖湘学派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学术流派，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湖南人才的成长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政治、地形、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众多区域文化，如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等，湖湘文化就是产生和形成于今天湖南地域范围内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两位伟人，即屈原和周敦颐。清代学者戴德诚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sup>①</sup>近代学术大师钱基博说得更加直白，他说：“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牟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铿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际，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sup>②</sup>屈原是楚国人，一般认为其出生地在今湖北姊归，但他被贬滴到湖南，长期在湖南生活。屈原是文学之鼻祖，他的很多文学作品是在湖南创作的。屈原是湖南古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山，湖湘文化正是以理学为主要特点的。因此，可以说产生在古代湖南地域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歌赋，实际上就标志着湖湘文化的萌芽；而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出现，则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

周敦颐创理学，湖南因之而产生了一批理学家，再加上胡安国父子和张栻等人的传扬和发展，湖湘文化成为一种理学形态的文化。理学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一种文化思潮。一方面它以儒家经典为宗，重新解释，发扬光大，促使了儒学的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佛、道诸家的哲理，使儒家学说更加完善，更加理论化。可见，理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和提高，更加适合封建社会的需要。唐以后，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北方，侵犯中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原地区战火不断，中原人口也纷纷南下避乱。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文化渐次崛起，开始超过北方。宋代，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重心，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产生在南方或在南方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学派，著名的书院，也在南方。北方的文化已经落在南方的后面，处在衰退之中。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到两宋时期，各地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特色、学术传统。北方有孙复的泰山学，张载的关学（陕西），司马光的涑水学（山西），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洛

---

**作者简介：**易永卿，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编审，哲学博士（湖南益阳 413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人才史”（05YB150）

阳），邵雍的百源学（河南）等。南方则更多，如朱熹的闽学，胡安国父子和张栻的湘学，苏轼兄弟的蜀学，陆九渊的象山学（浙江），吕祖谦的婺学（福建），陈亮的永康学（浙江），薛季宣的永嘉学（浙江）等。其中，周敦颐的理学，又称濂学、濂溪学，独具特色。而且自周敦颐之后，一批著名学者在湖南活动，使理学、湘学更加发扬光大。湖南更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学家，他们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湖湘文化。对此，真德秀指出：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南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说》，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跛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一出书，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大之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效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sup>⑤</sup>

以理学为思想主流的湖湘文化，其内涵包括“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基本特点是：因重经世，重践履，推崇理学，而不流于空疏或虚诞；因推崇理学，有务实的经世观念，躬行践履，而易流于保守；因理学和经世观念的制约，重躬行实践，而局限于政治伦理<sup>⑥</sup>。

## 二、周敦颐为湖南开创了一个教育鼎盛的局面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周敦颐为政一生，勤勉务实，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也为教一生，每到一地，兴教办学，致力于人才的培养。据度正所修《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周敦颐先后在郴州郴县、桂阳县，洪州分宁等地任职，每到当地，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郴县，他“首修县学”；工作闲暇时，他亲自讲学，“鲜事，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sup>⑤</sup>在任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主簿期间，周敦颐择地讲学，建立书院（后人称之为景濂书院）。后来，郴县、汝城人民分别建立“濂溪祠”、“濂溪堂”、“濂溪书院”，以纪念周敦颐。特别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周敦颐收程颢、程颐（后世称之为“二程”）兄弟为徒，这是他一生中中对教育事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写道：“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sup>⑥</sup>正是二程使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思想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由于周敦颐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培养，他的一代代弟子纷纷在湖南讲学授徒，从而在湖南开创了一个教育鼎盛的局面。宋仁宗曾诏令各地设立官学，湖南是执行得比较好的，有13个州（府、军）、31个县设立了官学。而书院的兴起和繁荣，更成为宋元时期湖南教育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据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两宋时期湖南书院近70所，其中四分之三是南宋时新建的，其中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影响最大，是当时中国四大书院之二。至于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创建的碧泉书院，则是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流。教育事业的繁荣为湖湘文化的鼎盛和湖南人才的鹊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敦颐重视教育，他的一代代弟子们都十分重视教育。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来到湖南衡山，隐居于紫云山下。他买地结庐，“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嵩雍者流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者辟之”<sup>⑦</sup>，建立碧泉书舍，讲课授徒。其受业弟子除胡氏子侄胡寅、胡宏、胡宁、胡宪、胡实等人外，还有一批湖南学子，比较知名的有：谭知礼、黎明、杨训、彪虎臣、乐洪等。外省学子也纷纷来到衡山，听课受业，拜胡安国为师。衡山也因碧泉书院开始成为宋代湖南教育和湖湘文化的中心，并由此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胡安国去世后，他的儿子、33岁的胡宏生活艰难，仍然独立治理理学，并将碧泉书舍扩大为碧泉书院，吸引了大批学子。“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踰济；云台断栋，来求槩曰之榘榘；天路渐逮，看引风声之骐驎；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sup>⑧</sup>战国时齐宣王在临淄稷门扩建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自由讲学、辩论、研究，成为当时百家学派会萃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之为“稷下学”。胡宏希望衡山成为第二个“稷下”。在胡宏的主持下，一大批学子慕名从全国各地到衡山拜师求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五峰学案》的案语中说：“绍兴诸儒

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事实确是如此，被称为“东南三贤”的三人，和胡宏都有师门关系：张栻是胡宏的正式弟子；朱熹虽未曾师从胡宏，但深受其影响，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朱熹为胡宏的“私淑弟子”；吕祖谦也受益于胡宏。故明人彭时认为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sup>⑧</sup>。衡山虽然未能像“傻下”一样，成为全国百家学派荟萃的中心。但在胡宏的主持下，衡山和“傻下”一样，开启了一个湖湘学派。从这一点说，衡山超过了“傻下”。胡宏成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湖湘学派、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川人张栻自幼跟随父亲张浚到湖南读书。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年），8 岁的张栻第一次来到湖南长沙，一住 5 年。绍兴二十年（公元 1150 年），张栻再次到湖南，在永州随侍父亲。十年后再到长沙，又享从父命至衡阳，师从胡宏。其后，寓居长沙，在城南妙高峰建城南书院，开始讲课授徒。乾道元年（公元 1165 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刘珙荐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前后 7 年。他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而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sup>⑨</sup>在教学活动中，他确立了辨理欲、明义利，传道济民，经世治国的办学方针，力求培养济世利民人才。在教学方法方面，张栻以新兴的学术思想——理学为传授内容，要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启动之际，谓道而外夫是，乌可乎！”<sup>⑩</sup>强调以自己研究理学的成果教授学生，解答学生在自学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同时，张栻还增加了岳麓书院的功能，使其由一个单纯的教育功能，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并独立于官学以外的大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朱熹从福建赶来长沙，与张栻会见，讲论学术，探讨义理，并在城南、岳麓大开讲坛，听讲者蜂拥而来。“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所谓潇湘洙泗之目焉。”<sup>⑪</sup>朱熹会讲是湖南教育史上的盛举，促进了湖湘学与闽学的交流，使湖湘学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由于张栻在长沙主讲城南和岳麓，也由于朱熹会讲的轰动影响，促使湖南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的中心由衡阳转移到了长沙。张栻的学术、人品，都受到时人推崇，被尊为“东南三贤”之一。因此，“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sup>⑫</sup>据李肖聃《湘学略·岳麓学略》记载，张栻门下的著名弟子有：胡时，字季随，福建崇安人；彭龟年，字子寿，号止堂，江苏清江（今淮阴）人；吴猎，字德夫，号畏斋，湖南醴陵人；游九言，字诚之，号默斋，福建建阳人；游九功，字勉之，号受斋，福建建阳人；周奭，字允升，号饮斋，湖南湘乡人；赵善佐，字佐卿，福建邵武人，吴伦，字子常，湖南零陵人；蒋复，字汝行，湖南零陵人；陈琦，字择之，号克斋，四川临江人；钟如愚，字师颜，湖南湘潭人；王居仁，字习隐，湖南常宁人；赵方，字彦直，湖南衡山人；钟炤之，字彦昭，江西乐平人；梁子强，字仁伯；蒋元夫，清湘人；谢用宾，湖南祁阳人；萧佐，字定夫，湖南湘乡人。可见，张氏门人弟子之多之盛。故全祖望针对“张栻弟子不如朱熹弟子”的论调，明确指出：“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sup>⑬</sup>张栻的教育活动，为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上述 18 名张门弟子中，湖南有 10 人，占 55.56 %。

朱熹（公元 1130 — 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江西人，生于福建。自幼聪慧好学，18 岁中进士，曾在福建、江西、湖南任地方官十年，其他时间多在福建生活和讲学，故其学称为“闽学”。他博学多识，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曾两次到湖南。第一次为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九月，朱熹由福建崇安抵长沙，与张栻会面，讲学岳麓书院。《岳麓志》说：“乾道丁亥，（朱熹）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至克己救仁之功。”听讲者众，车马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朱、张会讲、讨论的中心是所谓“中和”问题。“中和”，是《中庸》中的一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张栻等湖湘学者认为“心为己发，性为未发”。朱熹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见解；张栻也十分欣赏朱熹的许多观点。他们还同游岳麓、南岳等地，相互唱和，留下了许多诗篇。朱熹在岳麓书院留下了“忠孝廉节”、“道中庸”等手书匾额，以及“赫曦台”、“朱张渡”等古迹。第二次是绍兴五年（公元 1135 年），朱熹被任为湖南安抚使，驻长沙。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和平息湖南少数民族起事；二是整饬吏治，“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三是振兴岳麓书院。为了振兴书院，朱熹为岳麓聘请名儒主讲；扩大学生名额；颁布教规；扩建斋舍 500 多间；置学田 50 亩。朱熹还亲自到岳麓讲课，考察学业，由是书院名声大响，学者云集，多时达千人，“坐不能容”。特别是他颁发的《朱子书院教条》，提出书院教育的

总方针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强调学习的方法和原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外，朱熹还规定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为书院树立了一种新的学风。朱熹两次来湖南，并在岳麓讲学，培养了一批门人弟子，促进了湖南人才的成长，也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湖湘文化的发展。“自朱子以乾道三年监南岳庙，与南轩张子讲学长沙。自绍兴五年来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湖南正学大明。”<sup>⑩</sup>同时，朱熹还是最早为“湖湘学派”命名的学者，他在《朱子语类》中多次说到：“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总之，朱熹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湖南人才的成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

### 三、周敦颐推动了湖南形成人才群起的局面

从北宋当时来看，湖南人才虽然从数量上表现并不突出，但是，第一个本土大思想家周敦颐的诞生，却一改湖南人才“罕见史传”的局面，此后，湖南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才大省。周敦颐就像是湖南人才发展史上的一盏明灯，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学子不断前行。

周敦颐对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周敦颐兴学重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教育是直接培养人才的行为，学校是直接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如前所述，周敦颐一生十分重视教育，他每到一地供职，总是兴办学校，甚至亲自讲学授徒，不仅培养了程颢、程颐等一批优秀的学生，而且，他倡导的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湖南各地得到了发扬光大，官学、私学齐头并进，特别是各地兴办书院，为湖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例如岳麓书院，就先后培养了彭龟年、游九功、胡大时、吴猎、王夫之、陶澍、彭浚、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蓉、郭嵩焘、唐才常、熊希龄、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又如城南书院，曾有著名学者张栻、朱熹、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王先谦、郭嵩焘等先后担任主讲，湘中大儒李元度、左宗棠、民主革命家黄兴、陈天华、著名教育家杨昌济、谭云山、杨毓麟以及知名之士邓辅纶、樊锥、杨端六、皮宗石、文斐亦藏修于此；衡阳石鼓书院，曾有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闾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这些人才，都是湖南人才群体的重要成员。周敦颐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都受到他的影响，尊师重教，民风淳朴。例如：湖南汝城，周敦颐曾在那里工作过4年，当地人至今对教育十分重视，明朝时汝城就出现了一个进士人才群，共产生举人54名，其中进士15名<sup>⑪</sup>。湖南其他各地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例如益阳就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假如有人发现地上有写了字的废纸，就要立即把它捡起来塞到墙缝里，其含义是：废纸上写了字，那是文化，不能任人在地上践踏。清代中兴名臣湖南益阳人胡林翼，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捐官，他完全可以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但他受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立志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他选择条件十分艰苦、民情十分复杂的贵州安顺、镇远、黎平等地任职；太平军兴起以后，1854年，他毅然出黔抗击太平军；他虽然位至巡抚，但一生清贫，不贪一文，甚至把家里历代积累的财产全部投入教育事业，在家乡建立了箴言书院，实现了他父亲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遗愿，到他去世时，书院还没有完全建好，他在遗书中，要求把他葬礼收到的礼金全部用于书院建设，并要求他的子孙后代不得运用书院的财产。

#### 2.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学子

周敦颐是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哲学史上，宋代有濂（湖南周敦颐）、洛（洛阳张载）、关（关中程颢、程颐）、闽（福建朱熹）四大学派，而其中以周敦颐的濂学为首。周子开创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延续了文武周公孔孟的学术道统，所以清代乾隆皇帝赐给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得很清楚：“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

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sup>⑨</sup> 黄宗羲认为，到汉儒以后，传统的道统断裂了，直到周敦颐复兴儒学，二程继承了周子的道统。周敦颐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开创了一个学术的新时代。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阐扬，再到船山的总结与批判，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中国近代史上大批影响深远的学者、思想家、改革家，无不深受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影响，如著名的经世改革家陶澍、魏源、湘军统帅曾国藩等，都是理学大家。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王鑫、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生领兵，“上马杀贼，下马讲经”，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军，就是因为他们思想上受到周敦颐、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响，以理学为正统，视拜上帝教为邪说异端，奋起卫道，挽大厦之将倾。

在周敦颐理学思想的鼓舞下，湖南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北宋时期湖南人才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学术型和政治型人才，其共同特点是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多数出身于进士。北宋时期湖南人才，多文人学者，著名的有路振、周尧卿、周式、黄照邻、黄植父子、柳拱辰、柳平父子等。此外，还有曹衍、郑向、孙颀、谭知礼、杨训、乐洪、希白、狄遵度、禹偁、邓忠臣、武洞清、易元吉、廖李侨、苏坚、周寿、周焘、王观国等。上述人物，在文化学术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宋时期的湖南人才中，有不少是政治型人才，著名的有如陶弼、谭世绩、陈遘、狄斐等，以及朱昂、邵晔、胥偃、周湛、张颀、黄照、彭髓、李杰、邓雅、狄斐、斐栗、狄遵度、狄遵礼等，他们均有良好的官声政绩，其中陶弼、谭世绩、陈遘，较为突出。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当代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后世却影响深远。此后，随着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周敦颐倡导的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湖南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湖南人才的思想理念，湖南人才辈出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宋以后，湖南先后出现了南宋、明后期、清中期三个人才小波峰，并产生了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体，即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改革派人才群，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彭玉麟等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湖南维新人才群，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才群，以毛泽东、刘少奇、罗荣桓、贺龙等为代表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这一时期，湖南人才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全国最突出的，甚至有人说，湖南是中国的人才之都。

### 3. 周敦颐的人才思想

在为政、为教的实践中，周敦颐提出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培养人才的内容和方法，人才所应具备的品德和能力等多方面的问题。

#### （1）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学为圣贤”

周敦颐把人才的培养目标分为三个等级：“名士”、“贤人”、“圣人”，三者均属人才的范围。最理想的人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诚”的化身。《通书》说：“圣、诚而已矣”；“诚者，圣人之才”；“诚、神、几，日圣人”。“神”，当指奇异莫测、通晓一切的本领。“几”，即见微知著、明辨是非。又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周敦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孔子等，“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为孔子乎！”“贤人”，则是如伊尹、颜渊之类的人。这些人，就是周敦颐培养人才所树立的榜样。

#### （2）“学为圣贤”是可以实现的

周敦颐明确指出：“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几乎！”这段话的关键在一个“一”字，历代思想家都在说明这个字。有人认为：“一者，纯一也。”也有的说：“一者，是表里俱一，纯彻无二。”或是说：“无一毫私欲。”所谓“一”，就是纯无杂念，专心致志，只要确立了目标，以圣贤为榜样，就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

---

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即使不能成为圣贤，也不失于“令名”，即德行完美，成为有一定的名气和才干的人才。

### （3）圣贤人才的重要意义

周敦颐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圣贤人才。人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即是说：宣传美好的道德，解释诚、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制作礼乐，推行正道，哺育万物，化民成俗，树立良好风气，促使社会安定和平。二是“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即教育人们迁善改过，易恶至中。周敦颐将人的品性用“刚、柔、善、恶”四字分类，认为人有刚有柔，又可善可恶。即是说：刚可善，则“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亦可恶，则“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可善，即“为慈、为顺、为翼”；亦可恶，则“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俊”。人才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自易其恶”。

### （4）培养人才要以六经为主

《六经》是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即《诗》、《书》、《礼》、《易》、《春秋》、《乐经》。周敦颐“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孔孟”（孔延之：《即州新迁州学记》）。其中，他最重视《易经》。他说：“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他认为《易经》揭示了人生性命之渊源，是《五经》之本；而且还揭示了天地万物、鬼神幽冥的奥秘与规律，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教科书。《礼》和《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教材，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乐和”。“礼”、是伦理纲常、礼法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乐”则是陶冶人民的感情、转变社会风气、培养人民的优秀品德。“礼、乐”的结合，就能建立一个和睦幸福、安定团结的社会。他认为《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即是说：为后世树立仿效的楷模，对乱臣贼子则起着惩做的作用。他认为《六经》的教育，最基本的主要是培养人才的道德品质。同时，主张学习文辞，认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只有通过文辞，才能传扬好的道德品质，推行儒家的道德理想。

### （5）培养人才要“学思结合”

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学，学习的关键在于“思”。只有通过“思”，才能把学习得到的东西转化为行动。学是基础，“思”才可产生效果。周敦颐说：“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思”就是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综合能力、分析能力；通过“思”，才能决定取舍，才能变成自觉行动，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 （6）发挥教师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

周敦颐一生从政，却一直坚持讲学授徒；不仅是一个好官，而且是一个好教师。他为政也是教育人民，改良风俗；作为教师，则是更直接地培养人才。他认为教师的责任在于化民成俗，培养人才的道德品质，提高人才的学识水平；从而使人人向善，天下大治。“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首先，他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哪怕是圣贤也不是天生的，“圣贤非性知”。即认为圣贤也必须经过教师的培养教育，才能成才，“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其次，只有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产生真正的人才。他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人生下来是无知的，如果没有师友的教育，就会成为愚人、蠢人。他主张教师要以自己纯正的品德和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培养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

总之，周敦颐对湖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创立的理学思想是湖湘学派的指导思想，因而，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兴学重教，办学授徒，直接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而且，他的理学思想、人才思想、教育思想，都在后世引起了悠远的回响，为湖南开创了一个人才群起的局面。

**注释：**

- ①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
- ②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 ③ 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第40卷）。
- ④ 王驰、刘鸣泰、刘克利：《湖湘文化大观》，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1一巧页。
- ⑤ 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 ⑥ 程颐：《明道先生行状》。
- ⑦ ⑧ 《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巧3页，第202页。
- ⑨ 明嘉靖《建宁府志》（第17卷）。
- ⑩ 《南轩文集·邵州复旧学记》。
- ⑪ 《南轩文集·岳麓书院记》。
- ⑫ 康熙新修《岳麓书院志》（第3卷）。
- ⑬ 杨锡装：《城南书院志·改建书院叙》。
- ⑭ 转引自《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40页。
- ⑮ 《平江县志》，《平江书院新建君子祠记》。
- ⑯ 朱忠悦：《理学思想熏陶下的明代汝城人才群》，《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 ⑰ 黄宗羲：《宋儒学案》。